

馬 克 思

致庫格曼書信集



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

馬 克 思

致庫格曼書信集

人 民 出 版 社

1957年·北京

4012

馬克思·
致庫格曼書信集
天 藍 譯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850×1168公厘 $\frac{1}{32}$ ·印張4 $\frac{5}{8}$ ·字數102,000

1957年4月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40,000 定價(5)0.42元

統一書號 1001·325

目 录

英譯本前言·····	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1
1907年俄譯本序言·····	弗·伊·列宁	3
一 1832年12月28日·····		13
二 1861年11月29日·····		15
三 1865年2月23日·····		16
四 1866年1月15日·····		22
五 1866年4月6日·····		24
六 1866年8月23日·····		26
七 1866年10月9日·····		27
八 1866年10月13日·····		30
九 1866年10月25日·····		32
十 1867年2月18日·····		33
(馬克思致“北德意志报”編輯信, 1867年2月18日)·····		33
十一 1867年6月10日·····		34
十二 1867年7月13日·····		36
十三 1867年10月11日·····		37
十四 1867年10月15日·····		41
十五 1867年11月30日·····		42
十六 1867年12月7日·····		44
(約·狄慈根致馬克思信, 1867年10月24日)·····		45

十七	1868年1月11日	48
十八	1868年1月30日	50
	(給査・克特边尼的履历史表)	52
十九	1868年3月6日	54
二十	1868年3月17日	55
二十一	1868年4月6日	58
	(弗・佛萊里格拉特致馬克思信, 1868年4月3日)	60
二十二	1868年4月17日	61
二十三	1868年6月24日	62
二十四	1868年7月2日	63
二十五	1868年7月11日	64
二十六	1868年8月10日	67
二十七	1868年10月12日	68
二十八	1868年10月26日	70
二十九	1868年12月5日	71
三十	1868年12月12日	74
三十一	1869年2月11日	75
	(阿・盧格致史吞达信, 1869年1月25日)	77
三十二	1869年3月3日	78
三十三	1869年5月11日	81
三十四	1869年7月15日	82
三十五	1869年7月30日	83
三十六	1869年10月12日	84
三十七	1869年11月29日	85
三十八	1870年2月17日	88
三十九	1870年3月26日	91

四 十	1870年 3 月 23 日	91
	(倫敦中央委員會給布倫瑞克委員會的秘密通知, 1870年 1 月 16 日)	92
四十一	[1870年大約 5 月 5 日]	105
四十二	1870年 6 月 27 日	105
四十三	1870年 9 月 14 日	107
四十四	1870年 12 月 13 日	108
四十五	1871年 2 月 4 日	111
	(馬克思致“每日新聞”信, 1871年 1 月 16 日)	115
四十六	1871年 4 月 12 日	118
四十七	1871年 4 月 17 日	119
四十八	1871年 6 月 18 日	120
	(馬克思致“東方郵報”信, “国际工人协会”會議記錄)	121
四十九	1871年 7 月 27 日	125
五 十	1871年 11 月 9 日	126
五十一	1872年 7 月 9 日	127
五十二	1872年 7 月 23 日	128
五十三	1872年 7 月 29 日	128
五十四	1872年 8 月 26 日	129
五十五	1874年 1 月 19 日	129
五十六	1874年 5 月 18 日	130
五十七	1874年 6 月 24 日	132
五十八	1874年 8 月 4 日	133
五十九	1874年 8 月 10 日	134
	人名索引	135
	譯后記	144

英譯本前言

馬克思致庫格曼的書信集这里第一次以英文本問世。譯文以書信的原文为根据，全部原信藏在莫斯科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受信人留·庫格曼医生（1830—1902年）是汉諾威的一个外科兼妇科医生，營業很好；年輕的时候，他曾参加1848年的革命运动，而且終生都自視為馬克思的热烈的信徒。他研究馬克思的“拿破侖第三政变記”（1852年）和“政治經濟学批判”（1850年）后，即希望結識馬克思。1862年經由德国詩人佛萊里格拉特的帮助，他如願以償了，佛萊里格拉特那时是一个政治流亡者，住在倫敦。認識是以通信（參閱本集第一封信）开始的，但很快就成熟为相契的友誼。通信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來，庫格曼是能够給馬克思以某些寶貴的帮助的，如使他知道德国的情况，替“資本論”爭取傳播等等。他是第一国际的會員，曾作为代表出席过洛桑大会（1867年）和海牙大会（1872年）。

1874年，当馬克思和庫格曼同在卡尔斯巴德的时候，他們的友誼关系破裂了。虽然自称为馬克思主义者，庫格曼却从来沒有真正了解馬克思主义，或充分把握到馬克思学說的革命實質。他欽佩甚至崇拜馬克思这个思想家、这个科学和天才的人，但不能使自己和革命者的馬克思、革命的無产階級

及其政党的領袖和組織者一致。虽然是社会主义終必胜利的誠实信仰者，他却拒絕無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企圖以純粹改良主义的方法来实现他的理想。庫格曼的这些观点不能不促成他們彼此間的疏远以至决裂。

就是在决裂以后，庫格曼还保持着对于馬克思的“崇敬”，不断地从馬克思家屬和恩格斯那里問候馬克思，同时繼續他关于“資本論”的宣傳。他珍視馬克思的書信为“一生最大的驕傲”，并吁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在他死后把它們發表出来。

1902年，考茨基把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的理論机关刊“新时代”上發表了。論述巴黎公社的兩封信（1871年1月12日、17日）引起列宁特別的注意，并促使他从事于把这些信件用俄文出版。在列宁1907年写的并重刊在这里的序言中，他特別着重提到这些信件，并把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革命态度与普列汉諾夫对1905年莫斯科十二月起义的怯懦的机会主义者的态度作了一个对比。

在考茨基的版本中，他省略了几个段落，其中多半屬於私人的性質，但那对于馬克思傳記的研究却是有很大的价值的。此外，由于机会主义者的各种顧慮，他完全压下了1865年2月23日的那封信。这封信，即本集的第三封信，包含着一种对拉薩尔和一般所謂“现实政治”的机会主义的極端严厉的批判。馬克思揭發“现实政治”为一种反动的叛变性的政策，因为它認為“现实”就是它“鼻子跟前直接的利益，……可是，就事情的本性來說，工人阶级必須是誠实地‘革命’的。”当1907年列宁写作这篇序言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有这封信。

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1907 年俄譯本序言

弗·伊·列寧

我們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新时代”周刊所發表的馬克思致庫格曼的全部書信印成單行本問世，其目的在于使俄国的公众能更切近地熟悉馬克思和馬克思主义。馬克思在通信中用了許多篇幅叙述个人的事情，这是預想得到的。对于作傳記的人說来，这一切都是非常宝贵的材料。可是对于一般广大的公众，特别是俄国工人階級，尤其無限地重要的，是書信內那些含有理論和政治材料的地方。正是在我們这里，在我們所处的革命时代，研究这些材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这些材料显示了馬克思直接回答了有关工人运动和世界政治的一切問題。“新时代”的編輯們这样說是十分对的，“熟悉那些在偉大革命时期形成其思想和意志的人們的面貌，我們就会提高自己。”这种熟悉对于 1907 年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說来，更是加倍地必要：因为它給社会主义者在解决他本国所經歷的一切革命的直接任务时提供了大量的非常宝贵的指示。刻下俄国正在經歷一个“偉大的变革”。馬克思在相当动蕩的 60 年代所遵循的政策應該經常成为現在俄国革命中社会民主党人所遵循的政策的直接榜样。

因此，且讓我們只是簡單地指出馬克思通信中在理論上特別重要的各个地方，而較為詳細地談談作为無产階級代表

的馬克思的革命的政策。

从全面地更深刻地領會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1868年7月11日的那封信是特別值得注意的。馬克思在这里以反駁庸俗經濟学者的辯論方式，非常确切地闡明了他的关于所謂“劳动”价值論的理解。对于比較缺乏素养的“資本論”的讀者往往自然發生的那些对馬克思价值論的非难——也是那些“教授式的”資產階級“科学”的庸俗代表們最急于想抓住的非难——馬克思在这里作了簡單扼要和异常透徹的分析。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他闡明价值規律时所走的道路以及应当走的道路。他以許多最通常的非难为例，他把他的方法教給了我們。他說明了像价值論这样(好像是)純粹理論性的抽象問題和要求“永远保持思想混亂”的“統治階級利益”之間的联系。我們希望每一个开始研究馬克思和閱讀“資本論”的人当他研究“資本論”最初而又最难懂的几章的时候，能再三閱讀这一封信。

信中其他的在理論上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就是馬克思对各个作家的評價。讀着馬克思写得如此生动、充滿着热情、显示着对所有巨大思潮和对它們的分析的最广泛的兴趣的意見，你会感覺着你是在听取一位天才的思想家說話。除开他順便講到的关于狄慈根的一些意見之外，那些对于蒲魯东派的評論值得讀者特別的注意。在社会革命高潮时期投身到“無產階級中”来但不能接受工人階級观点又不能在無產階級“队伍”的組織中进行坚韧而艰苦工作的資產階級“优秀”的青年知識分子被少数的笔触描画得异常生动明白。

拿对于杜林的評論來說，它像是預示了九年以后恩格斯(和馬克思合作)所写的著名的“反杜林論”的內容。这本书有

茨德尔巴烏姆的俄譯本，可惜它不仅有些遺漏，而且還有許多錯誤，簡直是一個壞譯本。這封信里又有着對於杜能的評論，這個評論也涉及到了里嘉圖的地租論。早在1868年，馬克思就堅決反駁過“里嘉圖的錯誤”，最後在1894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三卷中則徹底地駁倒了這些錯誤。可是直到今天，修正主義者們——從我們超資產階級的甚至“黑色百人團”的布尔加可夫先生到“差不多正統的”馬司洛夫——都在重複這些錯誤。

同樣有意義的是對於布赫納的批判，其中有對於庸俗唯物論以及朗格（“教授式的”資產階級哲學的通常的論據！）那里抄來的“淺薄的空談”的評價。

現在讓我們轉到馬克思的革命政策。在俄國，有某種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觀念在社會民主黨人中奇异地流行着，仿佛具有特定鬥爭形式和特殊無產階級任務的革命時期竟是一種變態，而“憲制”和“極端反對派”却是常規。此刻，世界上沒有任何別的国家像俄國這樣正在經歷着一種深刻的革命危機——同時也沒有任何別的国家有採取如此懷疑和市儈的態度來對待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鄙視并庸俗化馬克思主義）。根據革命的內容是資產階級性這一事實，他們在我國倒得出庸俗的結論，認為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動力，認為無產階級在這一革命中的各項任務僅僅是輔助的、非獨立的，認為無產階級不能領導這個革命。

馬克思在他給庫格曼的信中是怎樣明顯地揭穿了這種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庸俗的說明的真面目呵！這里有一封1866年4月6日的信。這時候馬克思已經完成了他主要的著作。在他寫這封信的十四年前，他已經最後作出了對於德國1848年

革命的估計。1850年，他自己否定了他自己關於1848年社會主義革命即將到臨的社會主義幻想。在1866年，當他還僅僅開始觀察到新的政治危機正在醞釀着的時候，便寫道：

“我們的市儈們”（他意思是指德國的自由資產階級）“終於應該了解到，不經過一次革命來推翻哈布斯堡和霍亨索倫王朝……最後必定要引到另一次三十年戰爭……。”

這裡沒有一點幻想的影子，沒有以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它是從上面發生的而不是像馬克思所預期的那樣從下層發生的）即將廢除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而是非常清楚確切地認定，它只會廢除普魯士和奧地利的君主制度。可是對於這次資產階級革命是有着何等的信心呵！一個無產階級戰士，當他理解到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社會主義運動的向前推進有着巨大的意義的時候，是有着何等的革命熱忱呵！

三年以後，正當法國拿破崙帝國崩潰的前夜，馬克思指出“一個很有興趣的”社會運動，並且帶着一種顯然的熱情的爆發說道：

“巴黎人又在認真地研究他們不久以前的革命經歷，以便準備自己從事於那迫近的新的革命事業。”

在描寫了研究過去經歷所顯示出來的階級鬥爭情況以後，馬克思作出結論說：

“就這樣，整個歷史巫婆的妖鍋便都沸騰起來了。什麼時候我們那里也會是這樣呵！”

這就正是俄國知識分子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應該學習的一課，他們為懷疑所軟化了，被學究氣味陷於麻木的狀態，愛作懺悔的演說，很快就厭倦於革命，同時他們像盼望着節日似的盼望着革命的被埋葬，並用憲制的具文來代替它。他們應該

从这位無产阶级的理論家和領袖学得革命的信心，学得本領去喚起工人阶级坚持自己直接的革命目标到最后，学得精神上的坚定性，不允許因革命暫时的退潮而發出灰心失意的叫喚。

馬克思主义的学究們心想，这一切都是道德的空談和浪漫主义，缺乏现实主义！不是的，紳士們，这才是革命理論和革命政策的結合，否則，馬克思主义就变成布楞塔罗主义、司徒盧威主义和桑巴特主义了。馬克思的学說已把阶级斗争的理論和实践結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誰要是把冷靜地說明客观情况的理論曲解为对于現存秩序的辯护，甚而至于竭力尽可能迅速地使自己迁就于革命的每个暫时的退潮，尽可能迅速地丢弃“革命的幻想”而轉向于“现实主义的”修补工作，那他就不是馬克思主义者。

当着像似最平靜的、如馬克思所說“牧歌風味的”或如“新时代”杂志所說的“慘淡地停滯的”时期，馬克思却能察覺革命的到来，并喚起無产阶级对于自身先进的革命任务的自覺。而市儈似的，把馬克思庸俗化的我們俄国的知識分子却在最革命的时期，教給無产阶级消极的政策、馴順地“随波逐流”并胆怯地支持时髦的自由主义政党最不稳定分子的政策。

馬克思对于公社的評價是致庫格曼的書信中無上的光荣。这个評價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方法比較起来就愈益显出它的价值。普列汉諾夫在1905年12月后灰心失意地叫喊着：“他們本不需要拿起武器呀！”却謙虛地把自己比着馬克思，說馬克思也曾制止过1870年的革命。

是的，馬克思也曾制止革命。可是看看，就在普列汉諾夫自己所作的这一比較之下，普列汉諾夫和馬克思之間該有着

多么大的距离呀！

1905年11月，当第一次革命浪潮达到它的顶点的前一个月，普列汉诺夫不但没有坚决地警告过俄国无产阶级，而相反，却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并武装起来”。可是一个月后，斗争燃烧起来了，普列汉诺夫丝毫不去分析一下它的意义，它在一般事件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它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他便赶紧扮演懊悔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叫喊着：“他们本不需要拿起武器呀。”

1870年9月，公社以前的六个月，马克思直接地警告法国工人，起义将是绝望的傻事，这是他在有名的国际宣言中说的。他在事前就揭露了那种关于可能发生一次类似1792年的运动的民族主义幻想。他不是事后，而是几个月以前，就知道该怎样说：“不需要拿起武器来。”

可是，当着这一绝望的事业——像他自己9月里所言的那样——开始在1871年3月实现的时候，马克思又抱着什么态度呢？是否他只利用这点（像普列汉诺夫利用十二月事件那样）来“挖苦”他的敌人，即那些领导公社的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呢？是否他像一个女教员那样开始谩骂起来，说道：“我给你们说过，我警告过你们：看看你们的浪漫主义，你们革命的胡闹搞出什么来了？”是否他对公社人员也像普列汉诺夫对十二月的战士那样用自鸣得意的市僧口吻说教：“他们本不需要拿起武器呀？”

不是的。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写了一封热情的信给库格曼——我们愿意每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每一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在家里的墙上把这封信张贴起来。

1870年9月，马克思说这个起义是绝望的傻事；但到了

1871年4月，他看見人民的群眾運動起來了，他以一個參加者的極大注意來對待那標志着世界歷史的革命運動向前進一步的偉大事件。

他說，這是打毀官僚軍事機器的一種嘗試，而不是簡單地把它從一手轉到另一手里。同時他為那些被蒲魯東主義者和布朗基主義者所領導的“英勇的”巴黎工人唱着真誠的讚美歌。“在這些巴黎人身上該有着何等的靈活性，”他寫道，“何等的歷史首創性，何等的勇于犧牲的精神呀！”……“歷史上找不出類似偉大的類似典范。”

群眾的歷史首創性是被馬克思評價得比一切都高的東西。呵，只要是我們俄國的社会民主黨人也能從馬克思身上學到怎樣評價俄國工人農民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現的歷史首創性的話！

那在六個月以前就預見失敗的深刻的思想家對群眾歷史首創性所表示的尊崇——和那沒有生命的、沒有靈魂的迂腐說法：“他們本不需要拿起武器呀！”這難道不是有天壤之隔嗎？

馬克思曾帶着他性格上所特具的全部熱忱和激情來體驗這個鬥爭，他那時雖流亡在倫敦，却像一個群眾鬥爭的參加者似地馬上工作起來，評述那些準備“翻天”的“愚勇的”巴黎人所採取的直接步驟。

呵，現在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的“現實主義”的聰明角色們——他們在1906—07年笑罵俄國的革命的浪漫主義——該會怎樣譏諷當時的馬克思呵！人們該會怎樣嘲笑着那個唯物主義者和經濟學者，那個烏托邦的敵人，他竟向那翻天的“嘗試”表示崇敬之意！這些“套子裡的人”^①該會怎樣為他那

造反的傾向、烏托邦主義等等，為他對那翻天運動的評價而賜他以眼淚、寬容的微笑或憐憫呵！

可是馬克思並不具有被那些生怕討論革命鬥爭更高級形式的技術的小魚的聰明^②。他討論的恰恰是暴動的技術問題。防禦還是進攻？——他說道，就好像軍事行動在倫敦郊外進行着一樣。於是他決定，必定是進攻：“他們應該立即向凡爾賽進軍……。”

這是在1871年4月，即偉大的血的五月的前幾個星期寫的……。

“他們應該立即向凡爾賽進軍”——那些已開始從事翻天的“絕望的傻事”（1870年9月）的反叛者應該那樣。

在1905年12月，“他們本不需要拿起武器”用暴力來反對那企圖奪回已經贏得的自由的最初襲擊……。

是的，無怪乎普列漢諾夫把自己和馬克思相比！

“第二個錯誤”，馬克思在他那技術的評論中繼續寫道，就在於“中央委員會”（軍事領導者——注意這點——是指國民近衛軍中央委員會）“過早地放棄了自己的權力。”

馬克思知道應該怎樣警告領導者不要舉行尚未成熟的暴動。但他對於翻天的無產階級卻是一個實際的顧問、一個群眾鬥爭的參加者，不管布朗基和蒲魯東的錯誤理論，群眾究竟把整個的運動推進到一個更高的階段。

① 柴霍甫一篇小說中的主人公，不管任何天氣，他總是把自己包起來，同時，要是聽到誰提出自由的改革，便叫喚着：“我希望不要出什麼事情才好！”——譯者

② “小魚的聰明”——系指俄國諷刺家謝德林一篇童話中的“聰明的小魚”而言，那是描繪諸小愼微、混世度日的典型人物的。——譯者

“縱然情况这样，”他写道，“目前的巴黎起义，即使被旧社会的豺狼、蠢猪、下贱的走狗所镇压下去——那也是我党巴黎六月起义后最光荣的功業……。”

而馬克思，不會在無产階級面前掩飾公社所犯的任何一個錯誤，獻給這個功業一部著作，它直到今天仍旧是“翻天”斗争的最好的指南，同时又是自由派和激进派“蠢猪”的最可怕的妖怪。

普列汉諾夫獻給十二月事变一部“著作”，它已經差不多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聖經了。

是的，無怪乎普列汉諾夫把自己和馬克思相比。

庫格曼在給馬克思的回信中，显然表示怀疑，指出事情的無望，主張现实主义，反对浪漫主义——至少他把公社，即把起义和1849年6月13日巴黎的和平示威来相比較。

馬克思立即(1871年4月17日)給了他一个严厉的申斥。

“世界历史，”他写道，“真的就太容易創造了，假如斗争只有在毫無失誤的順利时机的条件下才进行的話。”

1870年9月，馬克思称起义为絕望的傻事，可是当着群众起来了，馬克思就願意和他們一起行进，和他們一起在斗争的进程中学習，而不是給他們以官僚式的訓誡。他理解到，要企圖事先完全准确地計算好每一个偶然的机会，那就是欺騙，或是不可救藥的迂腐。他把工人階級英勇地、自我牺牲地自己帶头起来創造世界历史这件事情珍視得比其他的一切都高。馬克思看待这个历史就是从那些創造历史但不能事先毫無失誤地計算到各种偶然机会的人們的立場出發的，而不是从那个教訓“这很容易預見到……他們本不需要……”等等的知識分子市儈的立場出發的。